

强制劳工贸易对社会资本的长期影响研究

贺 崑 崑*

摘 要: 苦力贸易是近代中国沿海的强制劳工移民活动。研究发现,即使在控制了个人和地理因素后,历史上的苦力贸易仍然显著损害了当地的社会资本。历史上曾经贩卖苦力的地区,居民的社会信任程度较低。考虑到可能的内生性,研究使用了个体所在地至主要的苦力出口港的距离作为工具变量。研究还发现,苦力贸易主要通过代际传承持续,而制度环境的传导机制较弱。随着新生代的增多,苦力贸易的负面影响有望得到缓解。

关键词: 社会资本;长期影响;强制移民

DOI: 10.13821/j.cnki.ceq.2025.05.17

一、引 言

近年来,发展经济学界已经不满足于使用直接因素解释贫富的分布差异,而是越来越多地将发展问题的根源延伸到历史领域(Nunn, 2009, 2012)。社会资本一直被视为影响长期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而信任是社会资本最重要的指标之一(Algan and Cahuc, 2010; Spolaore and Wacziarg, 2013)。正如肯尼斯·阿罗(Kenneth Arrow)所言:“实际上几乎每笔商业交易都内含着信任因素,尤其是在一段时间内进行的任何交易。可以合理地认为,世界上许多经济落后的现象可以用缺乏相互信任来解释”(Arrow, 1972, p. 357)。信任不仅促进经济增长,也与作为增长根本目标的幸福感密切相关(Helliwell, 2003; Kuroki, 2011)。在探索社会信任水平形成和影响的研究中,Nunn (2007, 2008)和 Nunn and Wantchekon (2011)的工作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起点。这些研究发现,非洲奴隶贸易通过削弱社会信任对经济发展产生长期负面效应,揭示了历史事件对文化规范形成的深远影响。后续研究也强调长时间和大规模的欺骗或暴力行为会削弱社会资本,即极端社会震荡和强烈不安全感将形成缺乏信任的社会规则并长期影响社会互动模式。本研究继承并扩展这一研究范式,探讨了清末苦力贸易如何影响当代中国的信任水平。

清末中国的苦力贸易类似于奴隶贸易,而强制性的奴隶贸易将增加社会不信任感。因此,我们的研究假设是:在中国历史上由于苦力贸易影响较大的地区,个人选择基于不信任的规则相较于基于信任的规则在历史上更具有生存优势,因而这种基于不信任的规

* 贺崑崑,江西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通信地址:江西省南昌市庐山中大道 1200 号财大慧园,330000;电话:15121115687;E-mail:wwhe14@fudan.edu.cn。本研究得到国家社科基金(24BJL041)的支持。感谢匿名审稿人和期刊编辑的宝贵意见。本文曾在第四届“历史视野下的经济发展与思想演进”学术研讨会和第十届量化历史研究国际年会宣读,感谢与会嘉宾的宝贵建议。感谢刘萍、黄珊珊在修改中提供的帮助。当然文责自负。

则可能更加普遍。如果这种规则持续到今天,那么即使在苦力贸易结束一个多世纪之后,个人的不信任与苦力贸易的历史分布之间仍然存在联系。

为了检验我们的假说,即历史上的苦力贸易改变了现代中国社会的信任文化,我们整合 2010—2021 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 CGSS)数据库和近代中国对海外的苦力贸易历史数据。通过数据分析发现,在历史上出口苦力越多的地方,受访者对于他人的不信任感越强。为了识别苦力贸易的直接和异质性影响,首先,我们控制了地理和个体变量来估算各地区受苦力贸易影响的程度。然后,在异质性分析部分我们发现出生于本地的受访者的信任水平相对于移民受访者受苦力出口影响更大。相对于其他群体,苦力贸易尤其会损害对老乡的信任感。同时,我们采用工具变量策略,使用受访者的地理位置与苦力主要贸易港口的距离作为苦力出口数量的工具变量。通过以上方法的综合应用,我们发现在排除其他潜在干扰因素的情况下,苦力出口显著削弱了社会信任。

在确认了近代苦力影响信任的因果关系之后,我们借鉴 Nunn and Wantchekon (2011)的研究思路考察两者之间的影响机制,并发现与既有研究不同的特点。首先,我们考察不信任的持续是否可以由制度来解释。实证结果发现,与国外的研究不同,制度环境在信任缺失的持续过程中并无显著作用。其次,我们采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 CFPS)数据对家庭内部的信任传承关系进行了考察,发现长辈的信任程度与晚辈的信任程度具有高度相关性。这意味着代际传承是苦力贸易的主要传递路径。最后,我们使用苦力出口与受访者年龄的交互项作为主要考察变量,发现年龄较轻的受访者较少因苦力贸易而产生不信任感,这意味着苦力贸易的负面影响将随着时间逐渐淡化。

我们的研究与以下研究相关,并具有一定的拓展意义。第一,在探讨强制劳动和强制迁徙的历史如何形塑现代社会的研究中,本文通过结合中国的历史和现实补充并深化了现有文献(Becker, 2022)。现有研究发现强制性的迁徙行为对接收地区和迁徙者本身都具有显著而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包括经济(Bauer et al., 2013)、教育(Becker et al., 2020)、健康(Haukka et al., 2017; Bauer et al., 2019)、政治(Dippel and Heblich, 2021; Chevalier et al., 2024)以及文化(Miho et al., 2024)等方面。较少的文献关注强制迁徙对来源区域的影响,其中近代的奴隶贸易是主要考察对象(Nunn, 2008; Testa, 2021; Dalton and Leung, 2014)。而苦力贸易是一种被忽视的、近似于奴隶贸易的行径。我们的研究考察苦力贸易对于苦力来源地的影响,并为强制迁徙文献补充了来自中国的案例。

第二,本研究加深了对于近代开埠通商以来西方如何冲击中国社会的了解。马克思主义叙事认为西方的入侵导致中国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近代化叙事则强调帝国主义因其具有的近代化成分在客观上也带给中国社会一定正面影响(吴承明, 1988)。近年来的量化研究将西方影响视为中国近代化的重要动力,主要集中于外来技术和制度影响,例如铁路、通商口岸、电报对近代化起到的作用(梁若冰, 2015; Lin et al., 2021)。新式的器物 and 制度不但促进经济发展,也推动了民族主义(Mattingly and Chen, 2022)和法

治建设(Jin, 2023)。这些研究强调了西方影响中的积极层面。本文不只是补充了一个负面影响的案例,也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把握近代历史对今天的影响。

第三,本研究补充了关于社会资本形成的文献。诸多历史因素影响了社会资本。除了非洲奴隶贸易削弱当地社会资本的研究,其他研究主要从政治、宗教两个角度对社会资本的生成理论进行发展。在Putnam(1994)发现意大利社会资本受到中世纪政治制度的影响,城市共和国的社会资本优于封建王国之后,一批学者从实证角度发展了政治制度的视角(Rainer and Siedler, 2009)。而在宗教方面,Schulz et al.(2019)发现受到教会影响较深的地区拥有更高的社会信任程度。近年来也有研究针对具体事件的疤痕效应^①进行分析,例如Alsan et al.(2020)发现对恶性医疗事件的隐瞒破坏了医学相关的信任。本研究展示了在中国苦力贸易的历史背景下,欺骗和强制迁徙如何恶化社会信任水平。

二、历史背景和假说提出

(一) 苦力贸易

苦力,即契约劳工(indentured labor),是可以进行残酷惩罚的强制劳动力,本文中特指1845—1874年从中国掳掠至拉丁美洲的劳动力。^②这一时期苦力贸易曾经盛行于中国沿海^③,被视为伪装在劳动合同外衣下的新奴隶制。在19世纪初期兴起废奴运动之后,使用奴隶的成本迅速上升,拉丁美洲的国家如古巴和秘鲁开始将中国人作为苦力贩卖。与此同时,有几十乃至几百万的中国劳工出国,其中一些人是由于中国清末时期的农村破产和生活困苦,自愿出国寻求生计。然而,大多数劳工实际上是被拐骗或者掠夺贩卖的,这些人被称为“猪仔”。

招募和贩卖“猪仔”的机构被称为“猪仔馆”,其成立过程一般为:一个中国人(或称为“猪仔头”)与外国雇主达成协议,由这个中国人负责向官方申请领取执照,然后他可以雇佣十多个助手来帮助他进行人口招募。这些助手每招募到一个人,就可以从中获得报酬。助手还可以进一步雇佣下级帮手,以此类推,形成一个层层剥削的网络。在“猪仔头”的带领下,陌生人、熟人,甚至亲戚都卷入苦力的诱拐、绑架和贩卖中,带给沿海社会极大的冲击和混乱。由于苦力贸易造成的社会恐怖气氛,中外舆论都观察到社会信任消亡。关于苦力强制贸易的具体案例、过程细节和时人对其恶劣影响的评价请见附录I。^④

苦力不但面临苦力船上的高死亡率,也面临工作地点的残酷虐待。19世纪中期以

① 疤痕效应是指历史上的创伤性事件即使结束,仍然对现实具有长期影响。

② 关于苦力贸易的定义复杂,对此中外学者理解各有不同。国外学者多关注1845—1874年间的强制人口贩卖(Ginés-Blasi, 2024),而中国学者在不同时期也存在不同的认识(吴凤斌,1988;龙登高和李玥晨,2022),这决定了苦力贸易的外延时空模糊不定并带来争议。但是无论采取哪种定义,1845—1874年向拉丁美洲的苦力出口都是公约标准的苦力贸易,而且其代表的劳工迁徙具有明显的强制特征,因此我们的研究关注这一群体。我们的研究对象和“下南洋”的移民有若干显著的差异,其中一个重要的差别是后者的移民主动性更强,社会地位也更高(Hup and de Zwart, 2024),关于后者对于东南沿海的积极影响请见陈方豪等(2024)。

③ 关于苦力贸易开始的时间学界存在争议。有学者认为早在1810年葡萄牙人就从澳门掠夺苦力。但是与此同时,中国政府多次下令严禁人口买卖。直到鸦片战争之后,苦力贸易才更加猖獗,呈现公开化,被认为是苦力贸易的“兴旺发达”时期。西方国家从中国口岸直接贩卖苦力是从1845年厦门开始的。

④ 限于篇幅,附录未在正文列示,感兴趣的读者可在《经济学》(季刊)官网(<https://ceq.ccer.pku.edu.cn>)下载。

后,一系列发生在苦力船上和苦力劳作地的恶行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促使各国重新评估苦力贸易。19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随着反对声音的上升,国际社会普遍要求限制苦力贸易。同时清政府加大了对苦力问题的关注,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抑制苦力贸易,包括在1874年派遣陈兰彬率团到古巴进行调查(陈晓燕和杨艳琼,2005),并与秘鲁签订保护华工的《中秘会议专条》(庄国土,1985)。在各种压力之下,澳门在1874年全面禁止苦力招募。由于在此之前澳门是提供给拉丁美洲地区苦力的主要来源,从此中国向拉美输送的苦力数量急剧下降,罪恶的拉美苦力贸易基本结束。

(二) 假说提出

在构建中国苦力贸易历史对现代社会信任影响的理论时,我们主要基于 Nunn and Wantchekon(2011)对奴隶贸易破坏社会信任的研究,并进行必要的补充和扩展。核心思想是将文化定义为个体面对不确定性或复杂情况时所依赖的启发式决策(heuristic decision making)。启发式决策指的是忽略部分信息,用更节省认知的方法做出选择。启发式决策形成了个体应对外界环境挑战的基本策略,特别是在信息获取存在障碍或成本较高的情境中,这些基本策略具有节约决策资源的作用。根据 Boyd and Richerson(2005),在信息获取成本高昂的环境中,个体倾向于依赖启发式决策策略,即基于一般规则而避免信息获取的成本。个体的启发式决策是否可以传播和扩大影响,进而形成地方文化则取决于决策模式在特定时空是否带来更强的生存能力。本研究认为对外部世界是否信任是一种启发式决策策略,在苦力贸易影响更深的地区秉持不信任策略将具有更强的生存能力(Gigerenzer and Gaissmaier, 2011)。因此,在经历了将近一代人的苦力出口浪潮之后,受苦力影响更深地区的居民具有更低的社会资本,即更少信任他人。

从历史不信任到现代不信任的传递机制可以分为代际传承和制度环境,两者的区别在于是否依赖家庭进行传承。代际传承又可以具体分为基因遗传和文化模仿两个路径。信任受到基因影响(Kettlewell and Tymula, 2024)。由于倾向于信任他人的个体在苦力贸易中更有可能被欺骗或者绑架,在苦力来源地经过“自然选择”留下更多倾向于不信任的个体。因此基因遗传成为影响当代信任水平的路径。然而,即使没有基因遗传渠道,在面对苦力贸易这样的重大历史冲击,社会文化仍可以被迫与之适应,受到苦力贸易冲击的一代人将对现有决策规则进行重新评估和调整,并最终固化成为新的文化规范和信念系统,通过口耳相传的社会化过程跨代继承,形成以家庭传递为特征的“文化基因”。制度环境是另一类可以影响信任的因素。研究表明文化和制度之间形成相互塑造和强化的循环(Guiso et al., 2008; Tabellini, 2010; Muthukrishna et al., 2021)。因此,苦力贸易对中国社会信任水平的影响可能不仅仅是文化规范的直接结果,文化变革可以通过影响制度建设进一步实现文化再生产。

如果历史冲击与当今信任之间的联系是存在的,那么我们可以追问这种联系是否可以改变。借鉴 Nunn(2007)提供的多重均衡模型思想,在苦力贸易的外生冲击之后,社会将转移到一个以高度不信任为特征的新均衡,从此长期保持不信任状态。但是也有研究表明随着时代变迁和世代交替,原有的冲击影响将逐渐消失(Bridgman and Greenaway-

McGrevy, 2023), 因此从长期来看苦力贸易的负面影响是可以得到改善的。

本研究的理论框架认为苦力贸易导致了受影响地区缺乏信任感, 其机制可以分为代际传承和制度环境。下文实证部分将对这一框架成立与否, 以及哪种机制占据主流进行分析。

三、实证方法与研究数据

在分析近代中国苦力贸易历史对现代社会信任水平影响的研究中, 我们采用了普通最小二乘法(OLS)来估计系数, 以探讨苦力贸易与社会信任之间的关系。此分析框架旨在评估中国不同地区的人群由于历史上参与苦力贸易而导致的信任水平差异。模型设定为:

$$Trust_{ic} = \beta_0 + \beta_1 Coolie_c + \beta_2 X_{ic} + \epsilon_{ic},$$

其中, $Trust$ 表示在 c 地区个体 i 的信任水平, $Coolie$ 是指个体所在 c 地区的苦力出口指标, X 代表一系列控制变量, ϵ 代表误差项。

(一) 信任数据

在本文中, 我们利用了 2010、2011、2013、2015、2017、2018、2021 年等 7 轮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来分析苦力贸易的历史对现代中国社会信任水平的影响。CGSS 是一个具有全国代表性的调查, 它提供了中国内地居民关于社会文化心态的丰富信息。该调查涵盖了 7 万多个受访者, 覆盖了中国 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 134 个县(区)。

核心被解释变量是对于社会信任的感知指标。虽然作为衡量社会资本的一般性指标, 2010—2021 年的历年 CGSS 数据库包括被调查者对多个对象或者机构的主观信任评价数据, 然而只有编号 A33 的相关问题在调查中保持不变。受访者被问及: “总的来说, 您是否同意在这个社会上, 绝大多数人都是可以信任的?” 答案以五分制给出, 1 分表示“完全不同意”, 2 分表示“比较不同意”, 3 分表示“无所谓同意不同意”, 4 分表示“比较同意”, 5 分表示“完全同意”。分值越高代表信任越强。基于这个变量, 我们可以衡量受访者对于整个社会保持的信任程度。为了确保分析的准确性, 我们从 CGSS 的数据集中剔除了无效回答或缺失数据的样本。处理后最终样本包含了 71 790 个有效观测值, 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数据基础, 用以深入探讨苦力贸易的历史如何影响现代中国社会的信任水平。

(二) 主要解释变量

我们使用清末府级层面的近代中国苦力出口数量来衡量苦力贸易的强度。我们利用了从近代中国口岸出口至古巴的苦力历史记录。选择古巴是由于在我们考察的时间区间内, 古巴是最重要的苦力流入地, 古巴苦力也是近代华工出洋中强制性最高的群体之一, 可以用于反映苦力来源, 历史记录来自《华工出国史料汇编》和《古巴华工调查录》中被出口至古巴的华工口供和禀帖。这些资料源于清末外交官陈兰彬 1874 年在古巴的苦力调查。其中苦力口供不仅包括了个人被出卖到古巴的详细过程, 其中还包括了个体

的来源信息；而禀帖则为被贩卖苦力对清政府的上书，上书的起始部分报告了上书人的籍贯。为了量化各地受到苦力贸易影响的程度，我们将上述苦力来源按照府级进行汇总统计，以每府出口苦力数量衡量苦力贸易对社会影响程度，回归分析时以千人作为计数单位。

（三）控制变量

除了信任问题和居住地，CGSS 数据库还收集了丰富的背景信息，包括一系列可能影响信任水平的社会经济指标，如个体的教育水平、年龄、年龄的二次方、是否城市居民、是否汉族和是否有宗教信仰等。此外，还包括地理层面的特征，如高程、崎岖度和是否沿海。

表 1 给出了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表 1 本文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被解释变量					
一般信任	71 790	3.474	1.029	1	5
其中：					
信任自家人	11 764	4.812	0.472	1	5
信任亲戚	22 751	0.865	0.341	0	1
信任同事	11 783	0.512	0.5	0	1
信任老乡	22 751	0.437	0.496	0	1
信任陌生人	22 406	0.13	0.336	0	1
信任中央政府	11 729	4.378	0.794	1	5
信任地方政府	17 311	3.609	1.087	1	5
解释变量					
出口苦力数	71 655	26.652	137.851	0	783
地均出口苦力数	71 655	0.984	4.82	0	27.226
人均出口苦力数	71 655	44.88	217.847	0	1 230.938
控制变量					
性别	71 872	0.474	0.499	0	1
年龄	71 868	49.924	16.707	17	118
非农户口	71 872	0.298	0.457	0	1
是否汉族	71 872	0.92	0.271	0	1
受教育程度	71 761	4.96	3.143	1	14
宗教信仰（无=1）	71 872	0.89	0.313	0	1
本地居民	71 872	0.689	0.463	0	1
高程	71 872	451.859	553.24	4.179	4813.53
崎岖度	71 872	208.673	163.145	1.448	1 643.59
沿海	71 872	0.214	0.41	0	1

四、实证结果

（一）基准回归结果

表2汇报了基准回归的估计结果。列(1)显示,如果我们使用是否同意绝大多数人可以信任作为被解释变量衡量社会资本,在不控制任何变量时,解释变量系数为-0.231,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为负。表明苦力劳工出口每增加1 000人,苦力来源地的信任指标相应减少0.231。这意味着苦力输出越多的地区,社会信任也越弱。列(2)—列(4)中我们加入了一系列有关受访者个人和受访地区的控制变量。作为核心解释变量的苦力系数仍保持稳健,而且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为负。这意味着与我们的假说一致,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如果清末不存在苦力贸易,现代社会资本将会更高。

表2 苦力贸易对于信任的影响(基准回归)

被解释变量	信任 (1)	信任 (2)	信任 (3)	信任 (4)
出口苦力数	-0.231*** (0.050)	-0.230*** (0.046)	-0.195*** (0.057)	-0.179*** (0.052)
固定项	3.511*** (0.020)	2.979*** (0.051)	3.498*** (0.026)	2.939*** (0.057)
个人变量	否	是	否	是
地理变量	否	否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观察值	71 573	71 465	71 573	71 465
拟合系数	0.011	0.031	0.011	0.032

注:***、**和*分别代表在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标准误聚类到受访县。控制变量包括个人变量,如教育水平、年龄、年龄的二次方、是否城市居民、是否汉族和是否有宗教信仰,以及地理变量,如高程、崎岖度和是否沿海。下同。后续回归表中控制变量包括本表中的个人变量和地理变量。

由于我们的核心解释变量是来自古巴苦力受访者的抽样样本,作为代理整体苦力贸易的指标可能受干扰因素影响,而五等分的信任指标作为核心被解释变量也存在遗漏信息的可能。因此,本文进一步基于加工后的数据进行稳健性检验,以此说明我们的实证结果受到数据处理形式的影响较轻。表3的列(1)中我们将A33问题回答“比较同意”或者“完全同意”的受访者视为信任他人,采用是否信任的虚拟变量取代信任的五等分指标,实证结果表明前述结论仍然成立。同时,在列(2)—列(4)中,为避免固有的解释变量指标影响实证结果的稳健性,本文分别将解释变量替换为是否有苦力贸易的虚拟变量,府级的地均出口苦力数量和人均出口苦力数量^①,得到的结果依然稳健。为了避免结果

① 我们将府级的苦力出口数除以1820年的府级的土地面积或者人口数量得到地均或者人均的苦力出口数量。

仅在古巴苦力中成立,在列(5)中我们使用了苏里南的苦力数量进行检验,结果发现更换苦力所在国不影响结果。

表 3 苦力贸易对于信任的影响(稳健性检验)

被解释变量	信任(虚拟)	信任	信任	信任	信任
	(1)	(2)	(3)	(4)	(5)
出口苦力数	-0.179*** (0.052)				
出口苦力(虚拟变量)		-0.106*** (0.023)			
地均出口苦力数			-0.005*** (0.002)		
人均出口苦力数				-0.120*** (0.033)	
出口苦力数(苏里南)					-0.273*** (0.080)
固定项	2.939*** (0.057)	2.945*** (0.057)	2.941*** (0.057)	2.941*** (0.057)	2.939*** (0.057)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观察值	71 465	71 465	71 465	71 465	71 465
拟合系数	0.032	0.033	0.032	0.032	0.032

本文实证结论仍然可能受到的质疑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第一,苦力贸易的长期影响系数是否来源于苦力贸易之前就有的历史因素。第二,苦力贸易的系数是否受到同时其他历史事件的影响,特别是在苦力贸易盛行时期,南部沿海社会也经历了其他的社会动荡。第三,实证结果是否受到改革开放之后沿海成为流动人口流入地的冲击。我们加入了“冲繁疲难”^①的虚拟变量,控制太平天国战争(1851—1864)和土客大械斗(1854—1867)的波及地点,以及改革开放后地区本地人口占比,结论均保持稳健。除了以上检验,本文还加入涉侨族谱作为控制变量,采用 Ordered Probit 回归模型进行数据处理,或者使用沿海省份小样本数据,均不改变结论。为节省篇幅,以上更多的稳健性检验内容见附录Ⅱ至附录Ⅴ部分。

(二) 细分指标回归结果

表 2 和表 3 的回归结果发现苦力贸易与一般信任的负向关系,但苦力贸易对不同类

① 清廷对地方实行“冲繁疲难”制度。地当孔道者谓之“冲”,政务纷纭者谓之“繁”,赋多逋欠者谓之“疲”,民刁俗悍、命盗案多者谓之“难”。以上四个指标都与地方风俗有很大的关联。

型受访者和信任对象的影响可能具有异质性,而这种异质性往往有利于进一步揭示主回归结果的机制。表4的列(1)—列(2)对比了受访者为本地人和外地人时,所在地区苦力出口的影响变化。控制个人和地区变量之后,列(1)中苦力出口对于信任的回归系数为-0.248,在1%水平显著为负,而列(2)回归系数为-0.114,且显著性下降;前者绝对值显然更大。这说明苦力贸易对于本地人的作用更大,其发挥影响的机制很可能更多通过代际传承渠道,而非制度等外部因素得以实现。

接下来我们要对不同社会对象的信任程度进行更细致的分析。由于信任的细分指标缺少像核心被解释变量那样的持续调查,因此我们只能从若干年份的CGSS中抽取相应的问题,并进行分类和重新赋值。关于家人的信任程度仅在2010年调查提及,受访者被问及对于自己家里人的信任程度。答案以五分制给出,1分表示“完全不可信”,2分表示“比较不可信”,3分表示“居于可信与不可信之间”,4分表示“比较可信”,5分表示“完全可信”。我们直接以回答数值衡量对于家人的信任程度。2010年和2015年的调查提供了涉及亲戚信任程度的不同问题,回答均以五分制给出。基于以上调查,我们创建了一个关于亲戚信任度的虚拟变量,如果2010、2015年调查回答4和5则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根据相似方法,我们也设定了信任同事(2010年)、老乡(2010、2015年)和陌生人(2013、2015年)的虚拟变量。

表4的列(3)—列(7)对比了苦力贸易对不同类型信任的影响。控制个体和地理变量之后,列(3)中苦力贸易对于受访者自家人信任的回归系数为-0.044,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不显著。而在列(4)—列(7)中对于亲戚、同事、老乡和陌生人信任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052、-0.038、-0.114和-0.046。回归系数均为负值,说明苦力出口对于信任的负面稳健影响。然而对于不同的信任对象,系数绝对值和显著性有很大的不同。苦力出口对于老乡的信任损害尤其显著。对于这一结果我们可以做出合理的推测:有别于天然具有信任感和利益绑定的家人,以及更为疏远的同事,老乡处于信任关系更为敏感脆弱的状态。一方面,在没有苦力贸易之前,拥有地缘联系更容易产生信任关系。另一方面,在苦力贸易的利益驱使下,这种信任关系可能转化为欺骗绑架的工具,因此也更容易受到苦力贸易的负面影响,造成信任关系的破裂。

表4 苦力贸易对于信任的影响(异质性分析)

被解释变量	信任						
	本地样本	外地样本	自家人	亲戚	同事	老乡	陌生人
	(1)	(2)	(3)	(4)	(5)	(6)	(7)
出口苦力数	-0.248*** (0.051)	-0.114** (0.057)	-0.044 (0.039)	-0.052* (0.029)	-0.038 (0.049)	-0.114*** (0.038)	-0.046* (0.025)
固定项	3.003*** (0.066)	2.792*** (0.086)	4.835*** (0.045)	0.890*** (0.026)	0.318*** (0.058)	0.537*** (0.045)	0.203*** (0.030)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续表)							
被解释变量	信任						
	本地样本	外地样本	自家人	亲戚	同事	老乡	陌生人
	(1)	(2)	(3)	(4)	(5)	(6)	(7)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观察值	49 317	22 148	11 748	22 656	11 765	22 656	22 322
拟合系数	0.033	0.033	0.002	0.006	0.012	0.058	0.036

（三）工具变量回归结果

尽管我们已控制了诸多可能同时影响苦力贸易和社会资本的个人及地理因素,但基准回归结果仍难以确定苦力贸易对社会资本的因果关系。这主要是因为一些未能观测的因素,如初始文化、交通环境、经济发展等,可能同时影响该地区苦力贸易难度和社会资本形成,从而造成对估计系数的“遗漏变量偏差”。另外,由于史料遗失的缘故,研究主要只采用了古巴的苦力样本来进行衡量,本身也可能存在测量误差并导致系数低估。

为处理上述内生性问题,我们使用各受访者所在县区到澳门距离这一外生变量,作为历史苦力数量的工具变量。首先,澳门是近代进行苦力贸易最著名的口岸。据陈兰彬的报告,道光二十七年(1847)至同治十一年(1872),从中国掠往古巴的苦力共约 150 000 人,其中仅从澳门一处就运去了 99 149 人(陈翰笙,1985)。澳门成为苦力的主要出洋地点具有偶然性。苦力贸易在 19 世纪 50 年代福建沿海的厦门开始繁荣,与早期“五口通商”的形成有关。由于当地人民的强烈反对,苦力贸易在 19 世纪 50 年代末逐渐向澳门等港口扩散。^① 葡萄牙控制下的澳门在 19 世纪 60 年代成为苦力招募的中心。其次,澳门的经济地位一直在上海、香港等地之后,从经济角度影响被解释变量的可能性较小。因此受访者所在县区到澳门的距离适合作为地方苦力数量的工具变量。

表 5 展示了工具变量回归的结果。在列(1)—列(4)中不论是否控制个体和地理变量,弱工具变量检验 F 统计值远大于 10,这表示工具变量是有效的。第二阶段回归结果表明在考虑了潜在内生性问题和测量误差之后,前文结论仍然保持稳健。解释变量系数绝对值稳定在 0.4 附近。与基准回归对比,表 2 的列(1)—列(4)的回归系数绝对值约为 0.2,工具变量估计的系数更大,说明苦力出口的内生性可能会导致基准回归结果低估。

表 5 苦力贸易对于信任的影响(工具变量分析)

被解释变量	信任	信任	信任	信任
	(1)	(2)	(3)	(4)
出口苦力数	-0.409***	-0.426***	-0.411***	-0.402***
	(0.123)	(0.120)	(0.142)	(0.136)

① 西方国家从厦门开始直接贩卖苦力,然而殖民主义者在厦门掠夺华工的罪恶活动激起了厦门人民的愤怒和反抗,以至于激起暴动(费正清,2021)。

(续表)

被解释变量	信任 (1)	信任 (2)	信任 (3)	信任 (4)
固定项	3.517*** (0.020)	2.981*** (0.052)	3.497*** (0.026)	2.941*** (0.057)
个人变量	否	是	否	是
地理变量	否	否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一阶段 F 值	65 702.27	66 614.24	58 434.94	58 600.94
观察值	71 573	71 465	71 573	71 465
拟合系数	0.010	0.031	0.010	0.031

(四) 持续机制分析

前文验证了清末苦力出口对社会资本产生的负面影响,那么其影响机制是通过制度环境还是代际传承仍有待进一步分析。

在 Nunn and Wantchekon(2011)的开创性研究中,研究者在回归模型的左边放入受访者对于政治机构的信任程度作为制度的代理变量,研究发现奴隶贸易对于制度环境具有显著负面影响。我们模仿这一做法,在回归模型的左边同时放入受访者对于中央和地方层面的政府的信任程度,回归结果见表6。在表6的列(1)—列(2)中,苦力出口数并未显示出对政府信任指标的负面显著影响,特别是没有显示出对于地方政府的不信任。因此,很难认为苦力贸易的长期影响是来自外部的制度改变。在表6的列(3)—列(4)中,我们在解释变量中加入受访者的一般信任指标。结果发现一般信任与对政府的信任显著正相关,而出口苦力的系数绝对值下降。以上发现说明出口苦力数更有可能是通过一般信任间接影响对于政府的信任。

表6 苦力贸易对于信任的影响机制(制度因素)

被解释变量	信任			
	中央政府	本地政府	中央政府	本地政府
	(1)	(2)	(3)	(4)
出口苦力数	-0.122 (0.099)	-0.039 (0.117)	-0.096 (0.097)	0.018 (0.116)
一般信任			0.103*** (0.008)	0.192*** (0.009)
固定项	4.048*** (0.079)	3.900*** (0.126)	3.774*** (0.084)	3.406*** (0.130)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观察值	11 713	17 293	11 696	17 274
拟合系数	0.092	0.034	0.111	0.069

在排除了苦力贸易通过制度因素产生持续影响的机制之后,我们给出代际传承作为机制的证据。由于主回归所用的 CGSS 数据为多年份截面数据,难以用来检验家庭中的信任传承,CFPS 数据调查了家庭内的所有成员的社会信任程度,因此我们采用了 2012 年的 CFPS 数据来构建信任指数(指数越大代表越信任社会)。数据处理过程请参见附录 VI。不同群体的晚辈对社会大众的信任指数具有显著差异。低信任长辈的家庭中晚辈对社会的信任指数约为 2.8。相反,高信任长辈家庭出身的晚辈对社会的信任指数约为 3.5。这种差异可能反映了长辈对社会的信任态度对晚辈的直接影响。我们在附录 VI 中进一步使用回归分析验证了长辈的信任指数对晚辈信任指数的影响,结果支持我们的代际传承假说。

在上文中我们已经排除了苦力贸易以制度因素作为影响机制,并给出了代际传承作为影响机制的证据。下面我们进一步分析这种代际传承究竟是多重均衡模式的稳定状态,还是可以随时间收敛的冲击-恢复模式。两种模式的区别在于前者意味着苦力贸易的负面影响更难以消除,后者则意味着影响可以逐渐淡化。由于我们的考察数据为多年截面数据,无法使用面板数据考察苦力贸易影响的代际稳定性,所以我们在回归方程的右侧加入苦力出口数和受访者年龄的交互项,用以衡量苦力贸易影响随时间的变化,回归结果见表 7。表 7 显示在控制了一系列变量之后,我们关心的交互项系数显著为负。这意味着年轻一代较少受到苦力贸易的影响,从长期来看苦力贸易的影响会下降。由于个体基因是很难改变的,这一结果也说明家内的代际传导机制更有可能通过文化而非基因的路径传递。

表 7 苦力贸易对于信任的影响机制(长期持续)

被解释变量	信任	信任	信任	信任
	(1)	(2)	(3)	(4)
出口苦力数	0.134 *	0.074	0.186**	0.128 *
	(0.069)	(0.063)	(0.073)	(0.067)
年龄	0.008***	0.011***	0.008***	0.011***
	(0.000)	(0.002)	(0.000)	(0.002)
苦力数与年龄的交互项	-0.007***	-0.007***	-0.007***	-0.007***
	(0.002)	(0.001)	(0.002)	(0.001)
固定项	3.118***	2.968***	3.099***	2.927***
	(0.023)	(0.052)	(0.029)	(0.057)
个人变量	否	是	否	是
地理变量	否	否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观察值	71 569	71 465	71 569	71 465
拟合系数	0.028	0.032	0.028	0.032

五、政策含义

现代的经济学研究越来越重视文化、规范和信仰在经济决策和行动中的作用,并试图理解文化差异的起源。本研究表明暴力和欺骗历史对于社会资本具有长期破坏作用。在过去了一个多世纪之后,强制劳工贸易仍然会显著损害当今的社会资本。因此,打击拐卖人口犯罪,保护公民人身与人格的基本权利,不仅功在当代,而且利在千秋。在机制检验部分,我们指出强制劳工贸易主要通过代际传承产生信任影响,说明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性并不会随着物质积累而自动消失。研究也表明我们不必过于悲观,随着新生代进入社会,强制劳工贸易对于社会资本的负面影响有望得到缓解。因此,家风建设可以通过作用于青少年,实现社会资本的长期好转。

参考文献

- [1] Algan, Y., and P. Cahuc, "Inherited Trust and Growth",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0, 100(5), 2060-2092.
- [2] Alsan, M., M. Wanamaker, and R. R. Hardeman, "The Tuskegee Study of Untreated Syphilis: A Case Study in Peripheral Trauma with Implications for Health Professionals", *Journal of General Internal Medicine*, 2020, 35(1), 322-325.
- [3] Arrow, K. J., "Gifts and Exchanges", *Philosophy & Public Affairs*, 1972, 1(4), 343-362.
- [4] Bauer, T. K., S. Braun, and M. Kvasnicka, "The Economic Integration of Forced Migrants: Evidence for Post-War Germany", *The Economic Journal*, 2013, 123(571), 998-1024.
- [5] Bauer, T. K., M. Giesecke, and L. M. Janisch, "The Impact of Forced Migration on Mortality: Evidence From German Pension Insurance Records", *Demography*, 2019, 56(1), 25-47.
- [6] Becker, S. O., "Forced Displacement in History: Some Recent Research", *Australian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022, 62(1), 2-25.
- [7] Becker, S. O., et al, "Forced Migration and Human Capital: Evidence from Post-WWII Population Transfer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20, 110(5), 1430-1463.
- [8] Boyd, R., and P. J. Richerson, *The Origin and Evolution of Culture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 [9] Bridgman, B., and R. Greenaway-McGrevy, "The Economic Impact of Social Distancing: Evidence from State-Collected Data during the 1918 Influenza Pandemic",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2023, 90101531.
- [10] 陈方豪、左毅博、龙登高, "涉侨宗族网络的经济福利效应——来自涉侨族谱的证据", 《经济学》(季刊), 2024年第5期第24卷, 第1704—1718页。
- [11] 陈翰笙, 《华工出国史料汇编》。北京: 中华书局, 1985年。
- [12] 陈晓燕、杨艳琼, "古巴华工案与晚清外交近代化", 《浙江社会科学》, 2005年第3期, 第159—165页。
- [13] Chevalier, A., B. Elsner, A. Lichter, and N. Pestel, "Forced Migration and Local Public Policies: Evidence from Post-War West Germany",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Economic Association*, 2024, 22(2), 915-962.
- [14] Dalton, J. T., and T. C. Leung, "Why Is Polygyny More Prevalent in Western Africa? An African Slave Trade Perspective",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2014, 62(4), 599-632.
- [15] Dippel, C., and S. Heblich, "Leadership in Social Movements: Evidence from the 'Forty-Eighters' in the Civil War",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21, 111(2), 472-505.

- [16] 费正清,《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21年。
- [17] Gigerenzer, G., and W. Gaissmaier, “Heuristic Decision Making”,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2011, 62 (Volume 62, 2011), 451-482.
- [18] Ginés-Blasi, M., “Indenture Beyond the ‘Coolie’ Trade: Reinitiating Chinese Indentured Migration to Cuba after the Chinese Commission Report (1874-1920)”, *Slavery & Abolition*, 2024, 45(3), 442-460.
- [19] Guiso, L., P. Sapienza, and L. Zingales, “Social Capital as Good Culture”,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Economic Association*, 2008, 6(2-3), 295-320.
- [20] Haukka, J., J. Suvisaari, M. Sarvimäki, and P. Martikainen, “The Impact of Forced Migration on Mortality: A Cohort Study of 242,075 Finns from 1939-2010”, *Epidemiology (Cambridge, Mass.)*, 2017, 28(4), 587-593.
- [21] Helliwell, J. F., “How’s Life? Combining Individual and National Variables to Explain Subjective Well-being”, *Economic Modelling*, 2003, 20(2), 331-360.
- [22] Hup, M., and de Zwart, “Brain Gain in Late Colonial Indonesia? New Evidence on Chinese Migration and Wages”, *CEPR Discussion Paper DP18748, R&R at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2024.
- [23] Jin, G., “Circle of Fortune: The Long-Term Impact of Western Customs Institution in China”,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23, 163, 103075.
- [24] Kettlewell, N., and A. Tymula, “Heritability across Different Domains of Trust”,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 Organization*, 2024, 219, 549-563.
- [25] Kuroki, M., “Does Social Trust Increase Individual Happiness in Japan?”, *The Japanese Economic Review*, 2011, 62(4), 444-459.
- [26] 梁若冰,“口岸、铁路与中国近代工业化”,《经济研究》,2015年第4期,第178—191页。
- [27] Lin, C., C. Ma, Y. Sun, et al., “The Telegraph and Modern Banking Development, 1881-1936”,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2021, 141(2), 730-749.
- [28] 龙登高、李玥晨,“人力资本跨国流动及其融资网络——基于特殊移民群体的历史考察与比较”,《金融评论》,2022年第2期第14卷,第53—64页。
- [29] Mattingly, D. C., and T. Chen, “The Missionary Roots of Nationalism: Evidence from China”,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2022, 84(3), 1638-1651.
- [30] Miho, A., A. Jaroschkin, and E. Zhuravskaya, “Diffusion of Gender Norms: Evidence from Stalin’s Ethnic Deportations”,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Economic Association*, 2024, 22(2), 475-527.
- [31] Muthukrishna, M., J. Henrich, and E. Slingerland, “Psychology as a Historical Science”,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2021, 72(Volume 72, 2021), 717-749.
- [32] Nunn, N., “Historical legacies: A Model Linking Africa’s Past to Its Current Underdevelopment”,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07, 83(1), 157-175.
- [33] Nunn, N., “The Long-Term Effects of Africa’s Slave Trade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008, 123(1), 139-176.
- [34] Nunn, N., “The Importance of History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Annual Review of Economics*, 2009, 1(1), 65-92.
- [35] Nunn, N., “Culture and the Historical Process”, *Economic History of Developing Regions*, 2012, 27(sup1), S108-S126.
- [36] Nunn, N., and L. Wantchekon, “The Slave Trade and the Origins of Mistrust in Africa”,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1, 101(7), 3221-3252.
- [37] Putnam, R. D., *Making Democracy Work: Civic Traditions in Modern Italy*.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 [38] Rainer, H., and T. Siedler, “Does Democracy Foster Trust?”,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2009, 37(2), 251-269.

- [39] Schulz, J. F., D. Bahrami-Rad, J. P. Beauchamp, and J. Henrich, "The Church, Intensive Kinship, and Global Psychological Variation", *Science*, 2019, 366(6466), eaau5141.
- [40] Spolaore, E., and R. Wacziarg, "How Deep Are the Root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2013, 51(2), 325-369.
- [41] Tabellini, G., "Culture and Institutions: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Regions of Europe",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Economic Association*, 2010, 8(4), 677-716.
- [42] Testa, P. A., "The Economic Legacy of Expulsion: Lessons from Post-War Czechoslovakia", *The Economic Journal*, 2021, 131(637), 2233-2271.
- [43] 吴承明, "中国近代经济史若干问题的思考", 《中国经济史研究》, 1988年第2期, 第153—160页。
- [44] 吴凤斌, 《契约华工史》。太原: 江西人民出版社, 1988年。
- [45] 庄国土, "清朝政府对待华工出国的政策——晚清华侨政策研究之四", 《南洋问题》, 1985年第3期, 第87—95页。

The Long-Term Impact of the Forced Labor Trade on Social Capital

HE Weiwei*

(Jiangx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Abstract: The coolie trade was a form of forced migration labor originating from China's coastal regions during the modern era. This study finds that historical exposure to the coolie trade has significantly undermined local social capital, even after controlling for individual and geographical factors. Specifically, residents from regions historically involved in the coolie trade exhibit persistently lower levels of social trust. To address potential endogeneity concerns, the study employs the distance from an individual's location to major coolie export ports as an instrumental variable. The findings further indicate that the negative impact of the coolie trade is primarily perpetuated through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with weaker effects observed through institutional mechanisms. However, as new generations emerge, the adverse effects of the coolie trade are expected to diminish over time.

Keywords: social capital; long-term impact; forced migration

JEL Classification: N35, O15, Z10

* Corresponding Author: HE Weiwei, School of Economics, Jiangx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No. 1200 Lushanzhong Avenue, Nanchang, Jiangxi 330000, China; Tel: 86-15121115687; E-mail: wwhe14@fudan.edu.cn.

CHINA ECONOMIC QUARTERLY INTERNATIONAL (CEQI) 征稿启事

ISSN: 2666-9331

主 编: 姚 洋

执行主编: 李力行

副 主 编: 黄卓 雷晓燕 陆 铭 汪浩

王敏 鄢 萍

编委会主席: 林毅夫

一、刊物介绍

《经济学季刊(国际版)》(*China Economic Quarterly International*, CEQI) 是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于2020年创办的经济学英文学术期刊, 本刊由 KeAi 公司(由 Elsevier 和中国科学出版社共同成立)以开放存取的方式在线出版。



二、办刊宗旨

《经济学季刊(国际版)》强调研究的问题导向, 旨在推动中国经济学研究的本土化、规范化和国际化, 增进中英文世界的学术交流与互通。

三、期刊特色

以英文撰写的原创论文投稿, 同时, 《经济学季刊(国际版)》接收的优秀英文论文, 也可以翻译成中文在《经济学》(季刊)中文版发表;

遴选《经济学》(季刊)中文版已接收的优秀论文, 经作者同意后, 翻译成英文投稿至《经济学季刊(国际版)》, 并进入快速审稿程序。

优秀的论文将有机会同时以中英文方式在《经济学》(季刊)中文版和《经济学季刊(国际版)》刊登, 扩大其在中国以及英文世界的影响力。

四、联系方式

CEQI 编辑部

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蔚秀园路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承泽园校区)(100871)

电话: (010)62758908

电子邮箱: ceqi@nsd.pku.edu.cn

关于 CEQI: 请登录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官方网站, 点击“出版物—《经济学季刊(国际版)》”获取

投稿网址: <https://www.editorialmanager.com/ceqi/default.aspx>

开放获取: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journal/china-economic-quarterly-international>

经济学(季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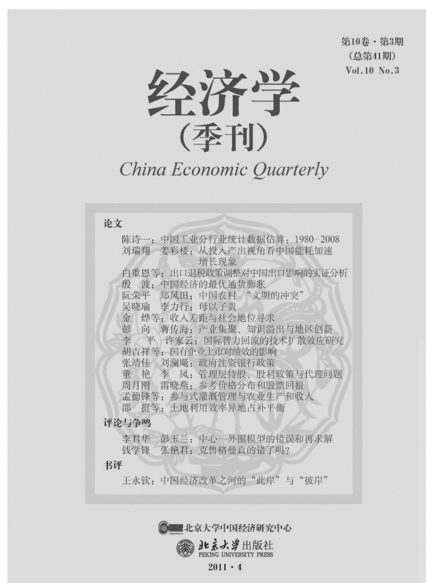
China Economic Quarterly

中文核心期刊
中国最具国际影响力期刊之一

刊号: CN 11-6010/F ISSN 2095-1086

中国经济学家高水平的发表平台
中国经济学界交流的聚焦点
中国经济学科走向世界的桥梁
研究中国本土问题的学者和学生的必读刊物

2001年10月创刊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创办
主编: 姚洋
学术委员会主任: 林毅夫



大16开本, 每期360页左右, 每年1、3、5、7、9、11月底出版, 每期定价58元, 全年6期共348元。

纸刊订阅: 北京国华卓越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座机: 010-69264576

手机: 18611609478 (微信同号)

订阅邮箱: 2850367080@qq.com

线上订阅: 淘宝网搜店铺“鼎方图书专营店”

订阅时间: 每年10月1日—12月31日订阅下一年度期刊, 款到后1周内开具发票, 按期快递发刊。

单期购买: 北京大学出版社官方商城



本刊设年度最佳论文奖, 奖金为人民币40000元。

主要读者群: 大专院校师生, 各类经济研究机构, 各类图书馆和资料室, 银行、金融、保险和证券机构, 各级政府机关经济管理部门, 企业经济问题决策部门, 及广大经济学爱好者。

地址: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经济学》(季刊)编辑部

邮编: 100871

电话: (010) 62758908

邮箱: ceq@nsd.pku.edu.cn

网址: <http://ceq.ccer.pku.edu.cn>

China Economic Quarterly

China Economic Quarterly (CEQ) is one of the leading economic journals in China sponsored by the China Center for Economic Research (CCER), Peking University and published by the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The journal is a publication forum for serious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research on China's economic transition to a market economy as well as on general economic issues. It brings the readers with the latest developments of economic research in China. Therefore, it is a must collection for academic libraries and scholars who have an interest in the Chinese economy.

From its foundation in 2001 to 2024 the journal has published 103 issues. From 2021 on it comes out bi-monthly in January, March, May, July, September and November. Each Issue contains about 380 pages and is printed elegantly with quality paper. It is in Chinese but an English table of contents and an abstract for each paper are provided.

The price for 2026 is \$180 and we welcome orders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For Subscription Enquiries, Please Contact:

China Economic Quarterly, National School of Development,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Tel: 0086-10-62758908

Email: ceq@nsd.pku.edu.cn

China Economic Quarterly

Order Form

Description	<i>China Economic Quarterly 2026 (6 issues)</i>
Price	\$180
Item	
Amount	
Full Name	
Address (Street/City/state/Zip/Country)	
Phone	
Fax	
Email	
<i>Note: The price includes all postage and packing and only checks are accepted.</i> Please mail this form and a check payable to <i>Peking University</i>, to the following address: <i>China Economic Quarterly, National School of Development,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i>	

There are also some back issues in stock which can be purchased in discount. Please feel free to ask.